

前沿报告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环境史？

□ 克利斯托夫·毛赫

在很长时间内，自然环境都是历史撰述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在200多年前，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的时候，这种情况完全被改变。自然科学家研究历史上自然的变迁，但历史学家却日渐排斥自然。最近发生的事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当我们思考2004年发生的、在几天内就吞噬了23万生命的印度洋海啸时，我们明白自然是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当我们思考汽车和工厂造成的、已经引起气候变化和气候移民的污染时，我们也会明白人其实扮演了一个环境破坏者的核心角色。如果历史学会当前的关注，或许就没有什么能把自然和环境整合进我们的历史撰述更重要的了。

跨越边界

把自然和自然的强大创造力纳入历史会带来历史编撰方式的革新，因为它会迫使我们从两个不同方面跨越边界。第一，打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第二，地域或国家边界将不再重要，在历史编撰中会产生新的研究空间、视野和方法。

其实，在人文科学中，我们的知识基础完全被禁锢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学科界限之内，这就导致产生的研究成果完全局限在本学科范围内。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自然科学就能发现，真正的创新思想是在不同的传统学科的交流

界面上产生的，如全球变化、神经科学。当我们参照自然的伟力而不是政治考虑对空间进行重新定义的时候，除了学科界限会开裂之外，还会发生第二个边界跨越。19世纪，英国人把野生橡胶带到巴西再到伦敦。尽管有严格的载重限制，他们只带了七万颗天然橡胶种子到伦敦郊外的皇家植物园，但这些种子成功地发芽出苗了。英国人把这些胶苗运到英国殖民地，栽种在锡兰和马来西亚，开始进行系统的橡胶生产。如果没有把橡胶籽走私到英国和马来西亚，世界历史将会是多么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在文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全球空间中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文化中，都有一个类似的关于大洪水的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是这方面的最早例证。在犹太——基督教中，它变成了诺亚的故事，还具备了宗教道德的意味。在印度公元前6世纪以来的文化中，它只是一尾警告人不要接近洪水的鱼，完全失掉宗教判断。在中国，大洪水神话用于荣耀大禹，因为他开辟河道以利耕作。显然，这样的故事在形成认同上发挥了作用，文化根据自然和技术的不同价值、思想以及道德和风险而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环境史——国际环境史——让我们能够运用比较方法和超越国家边界的视野去看自然空间，我们因此能看到差异性和相似性，并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

自然是一种决不能低估的影响。美

国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骑在牛背上的印第安人和牧牛的牛仔，我们难以想象美国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无穷无尽随风摇曳的麦田，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西部会是什么样。其实，仅仅是在500多年前，当西班牙人航海的时候，马和牛（还有狗、山羊、绵羊和猪）被带到新世界。碰巧，在中西部可以长到15英尺高的藤是从西进居民的拦路虎，经过焚烧后被蓝草取代。没人知道这些，没人会想到这里没有灌木、灌木丛、杂草，只有无意中偶然从欧洲带来的蓝草，而且它还散布在藤从原来生长的地方。蓝草籽随饲料槽搭上了跨越大西洋的船只，然后再由牛传到美洲各地。草籽和牛成了西进居民的秘密盟军，因为在蓝草生长的地方，都有小麦种植。

蓝草的例子教给我们两个道理。第一，自然有自己的动力机制——自然科学家可能用生态演替（从藤丛到蓝草）来概括——其对历史进程具有潜在的、难以想象的巨大意义。第二，对自然和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会强化我们对无意识的结果的认识。通过把自然当成是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演员，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历史理解模式不够了，目的和行为的概念也捉襟见肘了。草籽无意识运输、传染病的传播、害虫的扩散（单一种植农业造成的后果）都是人类无意识的后果。这些在经典历史叙述中都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但在环境史中它们将占据核心位置。

环境史能给我们带来希望吗？

环境史学家特别擅长讲破坏的故事：自然对人类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的破坏。但是，环境史也能给未来提供希望。让我们看一看18世纪50年代美国画家弗利德里克·丘奇画作中的景象。丘奇讴歌地壳剧烈运动在尼亚加拉形成的极端壮美景色中的“纯天然”性，他的画中并没有把现实中存在的锯木厂、磨粉厂、水电站和瀑布边上的木栅栏画进去。其实，尼亚加拉瀑布是个工业景观，但美国哈得逊画派的各位画家在自己的画作中都没有留下任何工业化和文明的痕迹。这些艺术家还与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奥姆斯泰德一起，买下部分工业遗址，建设公园。如果没有他们画中的景象和想象的虚拟世界，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就不可能建成。尼亚加拉的故事告诉我们，环境景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景观。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全球对亚马逊雨林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认识导致对这一辽阔地域的保护。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平方英里的巴西雨林遭伐木者的砍伐，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令人乐观和深受鼓舞的故事。

但是，或许最重要的故事是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故事，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是一把双刃剑，有陷阱有成功。如果不把诸如瀑布附近的商业蔓延、爱之运河的有毒废弃物等问题和挑战考虑进去，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的故事就不完整。如果不把大规模地破坏巴西亚马逊雨林周

围的热带草原考虑进去，亚马逊雨林的故事也同样不太可靠。毕竟，热带草原的开发是亚马逊雨林保护的直接后果。如果不能反映无意识的后果，所谓成功的环境景象的故事也只能是幻想的故事。

研究环境史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然和文化关系中的矛盾性，强调其他历史书写中没有注意到的盲点。环境史告诉我们，自然是我们这个星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经常是一个行动者。由于具有长远的发展的观点，对那些杞人忧天和纯粹以现在发生的事件为基础得出结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环境史是一服灵丹妙药。它教我们认识到，环境处在交汇点上，适应性是人类几百年来养成的一个特点。

环境史还教我们认识到，人类能在极端条件和资源短缺的环境中生存，如高海拔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或北非沙漠。这些故事都教导我们，要欣赏资源的价值，要认识分享的必要性，要赏识分配的公平性。当然，环境史还提醒我们，人不能控制一切。3600年前的火山喷发导致了米诺斯文化的覆没。如果没有这次火山喷发，希腊人、罗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怎么可能相继统治地中海呢？自然既是环境史的一个创造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我们的历史。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必须明白，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与我们选择讲自然、文化和历史的故事的方式紧密相连的事。（作者系欧洲环境史学会现任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红译）

从环境史到新全球史

□ 包茂红

环境史和全球史都是国际史学界新兴的研究领域。环境史学的兴起是历史学专业视野拓展和现实环境问题关注相结合的产物。强烈的现实性使之在兴起阶段具有“倡议史学”的突出特点，但随着环境史学在美国进入成熟阶段，它更多地具有了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其实，第一代环境史学家在开拓环境史研究时，他们的初衷是对传统的历史编撰发出挑战，要改变历史编撰忽略环境因素的片面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思维的排他性。现在，西方环境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环境史学的走向问题，希望能在罗斯比等前辈学者开创的全球环境史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再出发。

这种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并不完全冲突，宏观研究甚至可以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来进行。例如：如果从农业史来看环境史，那么环境史上就发生了三次引人注目的革命或出现三个转折点，分别是1500-1750年的农业革命，19世纪中到二战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二战以后到现在的第三次农业革命。如果从能源史来看环境史，那么环境史可以分为木材时代（1580年前）、煤炭时代（16世纪到20世纪初）和石油时代（20世纪到现在），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多中心霸权、英帝国霸权和美帝国霸权。显然，这样的历史分期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分期大不相同，与一般的环境史分期也有不小差别，从中观察到的历史大趋势也很不相同，但是，其中隐含的分期标准即人与环境的互动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历史新思维。

在此基础上，少数学者把关注范围从某个专题扩大到全球环境史，出版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例如雅克西姆·纳德考夫的《自然与权力：全球环境史》和约翰·麦克尼尔的《阳光下的新事物：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前者从全球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回溯，探讨了从史前到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后者从地球的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分析了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文明给全球环境带来的破坏。但在分析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时，作者并没有对人类文明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相反却认为，作为人类活动的无意识的副产品的环境破坏并不能导致人与环境关系走向不可调和，越来越得到文化塑造的人类总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总是在寻找环境变迁形成的、可以更好依靠的新环境。显然，这样的分析已经摆脱了早期环境史叙述中经常出现的生态狂热、环境千年至福等特点，显得异常客观和冷静超然。全球环境史研究实践了自然的历史创造性，同时更新了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改变了环境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衰退论”和“退化论”的取向，正在开启历史叙述的新模式。

把环境史新思维应用于全球史、建构新的全球史叙述模式尽管极其困难但也初露端倪。麦克尼尔父子都是卓有成就的世

界史学家，父亲注重文明交往，儿子重视环境史；父亲并不忽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儿子也重视从世界范围探讨历史交流。按理说他们要合作一部新全球史应该易如反掌，但他们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史》尽管从传统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有不少创新，但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确实不到位。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中指出，世界史有两大主题，一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故事，另一个就是环境史。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构成了世界史。但是，通观全书，怎么看都像把两大内容摆在一起，环境史和人类史并没有真正融合起来。这只能是我所说的狭义环境史。

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真正用环境史的思维构造全球史比较到位的是“大历史”，其代表作有：戴维·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和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的结构》等。大历史撰写的是自137亿年前发生的“大爆炸”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它最符合环境史的两个基本思维：第一，它改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编撰原则，把人和自然都还原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按大历史思维，如果假定宇宙的历史开始于13年前，那么人类的存在不过只有53分钟，农业社会仅存在了5分钟，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6秒钟。在这样的历史中，人类还能目无一切，唯我独尊吗？第二，它把人类置回它发生的宇宙或地球史中，有效地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统一起来，其共同点是复杂性不断增强，能量流动和消耗越来越密集。显然，这是我所说的广义环境史。不过，这样的探索和著述还太少，这样的知识尚未融入全球史的教科书。

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一样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两者之间似乎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如果能有意地贴近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顺着最新的潮流探索，那么中国的环境史和全球史研究都会少走很多弯路，会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样绽放出绚烂光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蹄瀑布，又称尼亚加拉大瀑布（Horseshoe Falls, Niagar），丘奇绘于1857年。

上下左右的历史

□ 梅雪芹

2009年8月4日，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一次前所未有的国际史学会议，即以“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为题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大会安排的第一个主题演讲者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保罗·克魯岑，一位以研究臭氧消耗著称的荷兰大气化学家，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1995年还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演讲的主题是“人类世”，一个用以标记他所谓的新地质时代的概念，2000年与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斯托默一同建构，将人视为一个影响全球环境循环的地质推动力。这样的科学家，这样的演讲，的确令关心并致力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变化研究的学者们兴奋不已。

“人类世”概念自问世以来，追捧者有之，非议者亦有之。但不管怎样，它迫使世人正视这样的事实：远在天边的冰川在消失，近在眼前的海平面在上升。它使人感觉到，这颗滋养万物星球的“发烧”，人类赖以创造和发展文明的自然根基在动摇。克魯岑等科学家甚至已与史学家联手，推出了更为严谨、严肃的科研成果，指出“人类世”因工业化开端而始于1800年左右，其主要特点是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人类在度过漫长的采集、狩猎和农耕时代之后进入人类世，并经历着如下三个阶段：1800年左右到1945年是第一阶段，即工业时代；1945年到2015年左右是第二阶段，即大加速时代；2015年左右是否进入第三阶段，即人类成为地球系统的管理者的时代，尚不确定。这样的研究，通过“人类世”这一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将人类史和地球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它促使史学工作者更加

清醒地反思：人类历史在整个地球地质史上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人类文明发展到了怎样的关头，其命运如何？古老的历史学又是如何因应变革，焕发新生的？

以大的时空尺度来衡量，人类历史，尤其工业文明这一段，在地球史、生命史中非常之短暂。因此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将我们所知的所有文明视为“同时代的文明”，而英国学者克萊夫·库廷在《绿色世界史》中的刻画更加入木三分。他说：“如果本书按历史编年给人类历史确切说明的话，那么本书407页中，405页都不得不用来说明采集和狩猎群体，只有2页供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化社会只有2行的空间。”然而，在短促的工业文明阶段却因人口规模的大增和经济发展的加速，而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地球物理营力，其活动和影响无处不在。如今，人类全面进入海、陆、空三栖时代，干扰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的地质推动力，威胁着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被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的自然，则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明显后果反作用于人类。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公民个人、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类文明已然发展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人类及时做出了正确抉择。很快，“地球日”运动兴起，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新文明路标赫然矗立，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则日益成为现时代的最强音。

在环境危机和环保运动的驱使下，以探索人类文明之命运为己任的史学家们，纷纷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

行为革命”。这群人以美国学者为表率，他们“共同走出门去，徜徉在田野、树林和露天当中”，在那里发现了更多的、始终都在起作用的基本力量。这样的行为和结果，既是他们作为公民积极参与环保运动的反映，也是他们作为学者推进“自下而上”的史学变革浪潮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努力，史学关怀甚至从社会的下层进一步深入，直至深入到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地球本身。于是，一个新的史学门类，也即环境史应运而生。可以说，环境史是环境危机催生的历史。

环境史自美国兴起后，迄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国际史坛和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其自身的史学品格也日益彰显。环境史以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将系统内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勾连起来，使原本共同织就历史之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成为史学的经纬线，并致力于研究特定时空下也即某个网络结点上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以图完整地揭示构成历史网络的生命之间以及生命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固有联系及其走向。环境史关注我们头上的天空、脚下的大地、周遭的动植物……上通下达，左顾右盼，是其叙事风格。可以说，环境史是上下左右的历史。

环境史引进生态系统范畴，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也即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而大大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其历史思维空间空前开阔。环境史对于历史内涵的认识和探究不同于



政治史、社会史等史学门类，因而需要学习并借鉴以生态学为核心的众多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可以说，环境史是多学科交叉的历史。

环境史的根本宗旨，是要讲述一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也即人类家园变化的故事。而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小到我们朝夕栖止的地方，大到整个地球，其变化的故事都可以成为环境史叙述的对象。叙述它们，不仅是为了推动历史学的发展，而且是为了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家家园的呵护，同时审视自己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道德水平。可以说，环境史是现实关怀的历史。

环境史的诞生和发展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历史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彼此相互制约的提法，具有深刻的含义。如果说，在19世纪，这主要还是一个理论命题，到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环境史学家则聚焦于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界面，奋力展开全方位的实证研究，从而将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史实陆续揭示出来，为人类探索“与自然和解”以及“本身和解”的道路贡献了史学的智慧。（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